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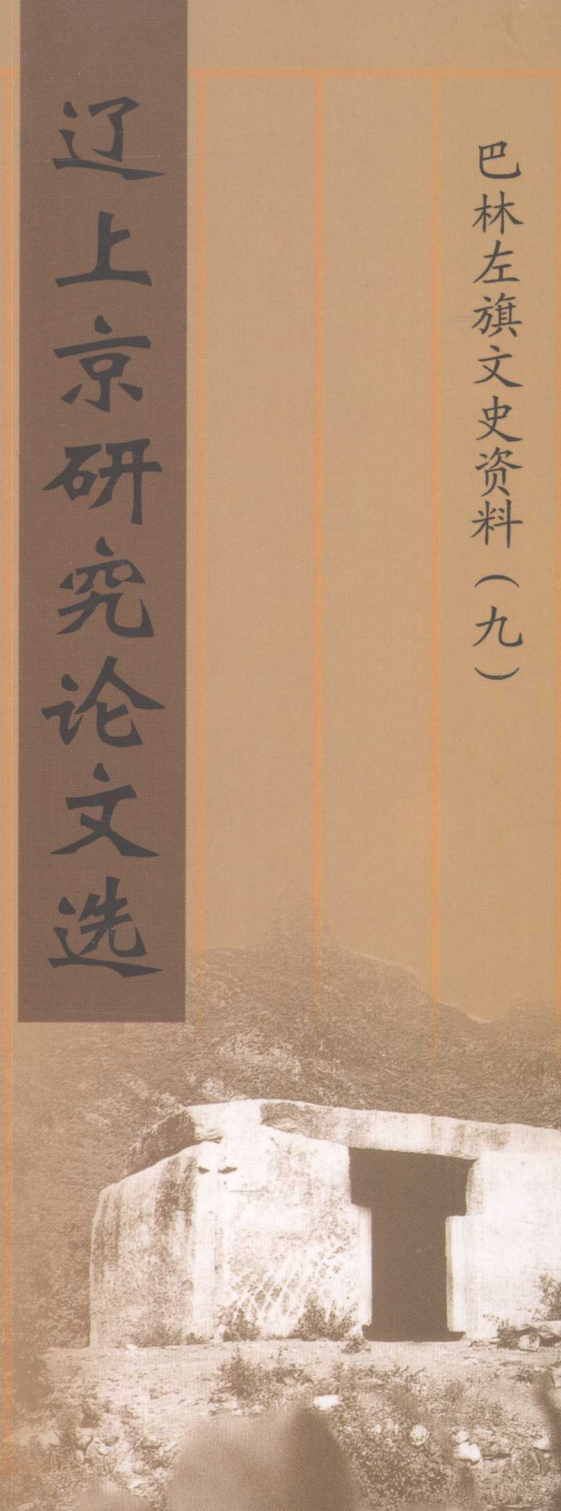
巴林左旗文史资料（九）

辽上京研究论文选



主编 王玉亭

政协巴林左旗委员会



巴林左旗文史资料（九）

辽上京研究论文选

主编 王玉亭

政协巴林左旗委员会

《辽上京研究论文选》策划人员名单

总策划：韩 铭 孙庆莲 邱文博 阎 彪
策 划：白景武 朱玉民 鲍爱民 李 国

《辽上京研究论文选》编辑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阎 彪
副主任：刘 峰 李清玉 张国华 李建军
 范雅秀 包凤堂
委 员：王玉亭 陶建英 王未想 葛华廷
 金永田 王青煜 王志刚 张建阁

序

辽上京是辽王朝的首都，其政治、文化、军事的影响力甚为深远，由此，历来为众多辽金契丹女真史乃至北方民族史专家、学者所关注，相关论著颇多。深入地研究辽上京，将会推动对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是加深认识辽王朝之所必须。这是一个史学的课题，是一个中古时期北中国历史地理的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当代课题。以史为鉴知兴衰，反思过去明得失。编辑、出版《辽上京研究论文选》的目的，一是为响应赤峰市委、政府提出的“建设文化大市”号召，一是为落实巴林左旗旗委、政府提出的“打造辽文化品牌”的战略做一点实实在在地工作，一是为了“左旗人知左旗历史”而服务。同时，借此对历史上辽上京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的一次回顾和总结。现实地讲，希望通过这一书稿的印行，使得我们巴林左旗生丁当代者更加深刻地了解辽的首都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历史，进而更加自觉地保护好我们的“文脉”，并在厚积的历史基础上开创更加辉煌的业绩。

我们相信，在旗委、政府领导下，通过各族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会创造无愧于历史的业绩，巴林左旗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阎 彪

2006年2月13日

目 录

序	(1)
---------	-----

(城址探源)

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论述	董新林 (1)
辽朝上京的营建及其划时代的意义	田广林 (20)
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37)
辽上京勘察琐议	张 郁 (88)
辽中京为后期首都说商榷	李逸友 (99)
九层台、日月官及太祖庙	金永田 (111)

(山形水势)

关于辽代木叶山的再考察	陈永志 (115)
滦流河非辽上京河流	王 晴 (130)
辽上京附近水道辨误	冯永谦 (135)
辽上京临潢府所临潢水之考辨	葛华廷 (151)
《萧兴言墓志》所载西楼、潢水略考(节选) ..	唐彩兰 (159)
辽上京之御河、沙河质疑	葛华廷 (161)
辽上京“负山抱海”释疑及河流水道考察 ..	罗树坤 (168)

(遗迹踏寻)

辽祖陵踏查记	金永田 (183)
辽祖州石室考	葛华廷 (194)
祖州石室探索	张松柏 张雷 (210)
辽代全州考	金永田 (225)
古洞·天书	金永田 (228)

巴林左旗后召庙石窟寺面貌.....王未想 (230)

(墓葬、壁画及服饰)

辽上京发现辽代鲜演墓碑.....王未想 (233)

辽代鲜演大师的几个问题.....朱子方 (239)

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金永田 (248)

辽上京城址周围出土的墨书铭文骨灰匣.....王未想 (254)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巴林左旗博物馆 (264)

辽国上京发现的契丹族墓葬壁画.....王未想 (276)

契丹传统袍服及辽朝乐舞人物服饰浅探.....王青煜 (281)

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及画像石初探(节选)...金永田 (298)

(文物的意味)

辽代人钮押印管见.....王青煜 (303)

契丹人忠诚的伙伴-猎犬.....金永田 (309)

镇墓石犬.....左利军 (312)

两件辽代大雁纹饰春水饰品.....张兴国 (315)

辽上京出土“击腰鼓人物”玉牌浅析...王景志 金永田 (320)

辽代铜镜浅议.....李学良 (324)

俊貌茵镇.....许秋艳 (329)

浅议契丹人春水秋山习俗.....于静波 (331)

(玉田韩氏)

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人墓志铭考释...刘凤翥、金永田 (336)

辽代《韩德昌墓志铭》和《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考释

.....刘凤翥、青格勒 (365)

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	唐彩兰、刘凤翥、康立君 (392)
韩匡嗣墓志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葛华廷 (405)
耶律宗福墓志浅探.....	王青煜 (421)
从辽代韩知古家族墓志看韩氏家族契丹化的问题.....	王玉亭 (446)

(辽都钱币)

辽上京临潢府及其附近发现的银铤概说.....	王未想 (463)
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三件宋代银铤.....	金永田 (484)
辽上京出土的契丹银币释文.....	王 晴 (490)
再论辽朝有铁钱.....	齐文、金永田 (492)
辽上京出土辽代窖藏部分古铜钱.....	康立君 (498)
内蒙古巴林左旗土木富洲出土辽代窖藏钱币.....	康立君 (508)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古城发现“瓷钱”和“陶钱”	康立君 (522)
契丹压胜钱考.....	王青煜 翟激扬 高 娃 (524)

(组织教化)

辽上京首次发现“踏石”.....	金永田 (530)
辽代的一个文化学术传播园地——辽上京寺院功能另考	王未想 (533)
辽上京研究论文(部分)目录.....	(544)
后记.....	(551)

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述论[★]

董新林

辽代共建有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城是营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都城，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代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旗林东镇南，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的一颗明珠。1961年，辽上京城址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足以表明辽上京城址的重要价值。

一、文献所地上京城址的营建与废弃

关于辽上京城，宋代人撰写的文献中已有简约的记载。《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一》载：（契丹）“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官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1〕}叶隆礼的《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2〕}也有相关记载：“上京，所谓西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汉）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3〕}、《契丹国志·四京本末》、《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等文献仅仅简单地论及了辽上京城的特点、方位和概况。关于辽上京城的具体情况，还要从《辽史》中去了解。

★本文发表于《北方文物》2006年第三期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云：“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靛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官。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上京，太祖创业之地。……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郭郭，建官，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中有历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太宗援立晋，遣宰相冯道、刘煦等持节。具卤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应天皇后尊号。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特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

这一段文字记录了辽上京营建的概况。关于辽上京城的平面布局，《辽史》也有专门记载。

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义节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故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贝圣尼寺，绫锦院、内省司、曲院，膳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

鹈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驿西福先寺。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西门之北易俗县，县东迁辽县。”⁽⁴⁾

这是现知文献中对辽上京城形制布局最为详尽的记载，无疑显得十分简约和含糊不清。因此，后人对上京形制的研究分歧很大，各持己见，难有定论。

《金史·地理志上》记载辽上京城废弃的过程。“临潢府，……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天德三年罢。贞元元年以大定府为北京后，但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大定后罢路，并入大定府路。贞二年四月尝侨置于平州（原注：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官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统九年尝避暑于此）。”⁽⁵⁾

依据以上的文献记载，可以将辽上京城的兴废分为四个阶段：1. 初创阶段，指建都前；2. 兴建都城阶段；3. 都城使用阶段；4. 城址的废弃阶段。

（一）初创阶段，是指建都前的时期（918年以前）

上京城故地原称“菑甸”。选定作政治中心后，建有“龙眉官”，通常被称作“西楼”⁽⁶⁾。据史料记载，从唐代中期以来，辽上京故址就一直是契丹迭剌部的主要居地。唐天复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机成为迭剌部夷离菑，对外征讨接连告捷。天复三年升为契丹总知军国事的于越王，阿保机的领袖地位得到巩固。这时，“西楼”已经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决策中心之一。

阿保机称帝（907年）后，开始在“西楼”营建官庙，先后建有明王楼、天雄寺和开皇殿等。据《辽史·本记第一·太

祖上》记载，太祖称帝第二年（908年）冬十月己亥朔，修建明王楼。第六年（912年），太祖“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不幸的是，第七年三月，叛乱的刺葛、神速姑等人洗劫“西楼”，焚烧了明王楼。太祖很快平定叛乱，于当年八月，又回到“龙眉官”，处置逆党。于次年“冬十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

从只言片语的文献看，这阶段，尽管迭刺部的权力重心在西楼，但是由于反对势力较强，阿保机真正的根据地可能是在龙化州。阿保机广用汉人，成为于越王之前，于唐天复二年（902年）在潢河之南建龙化州，设开教寺。在唐天复四年（904年）扩修龙化州之东城。称帝第三年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辽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城筑坛登基，正式建国，国号“契丹”。阿保机登基建国，这种特别重要的事情也是在龙化州进行的。由此推知，阿保机此时的政治中心当在龙化州。

（二）兴建上京城阶段（918～938年）

据《辽史·本纪第一·太祖上》记载，神册三年（918年）二月，阿保机开始在选定的都城地点“西楼”，大规模地“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这时，西楼被称为“皇都”，上京城初具规模，并且初步确立了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这可算是上京城营建的开始。

辽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率兵平灭渤海国，使契丹国力大增，随即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营建上京城。实际上，上京的营建主要是天显二年（927年）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进行的。到辽会同元年（938年）六月，太宗“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

帝王事于两虎”^[7]。至此上京城基本建成。同年十一月，契丹灭后唐得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大辽”，同时将“皇都”改称为“上京”，府曰临潢。辽代历史上第一座都城——上京城开始了近二百年的辉煌。

这时期辽上京城的布局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太宗将皇城建筑由原来以东向为尊改为南向为尊。

《辽史·地理志一》记载，辽上京皇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辽太宗曾“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准备接受后晋使臣进奉燕云十六州图籍。其用意是要表明依从汉制，一并控制汉族和中原地区的雄心。诚如《辽史·百官志一》所云：“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8]

薛映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出使大契丹国时，对上京城内如此描述：“……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9]这似乎说明在上京皇城及大内里的建筑群确有东向和南向之别。

（三）上京都城使用阶段（938～1120年）

史料记载，从会同元年辽上京城建成起直到辽代灭亡，上京城一直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文已经谈过，尽管有东京、南京、西京和中京诸城，都没有动摇上京的中心地位。在“澶渊之盟”背景下建立的中京城虽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契丹人的意识中仍然属于陪都的性质^[10]。《辽史·百官志四·南面京官》表述得较为清楚：“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

（四）上京城逐渐废弃阶段（1120～1230年前后）

《金史》记载，金天辅四年（1120年，即辽天庆十年）春，金兵进攻到辽上京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临督战，克了上京外城，辽朝留守挾不野率众投降^[9]。北宋使臣赵良嗣在金兵克上京后，曾与金太祖阿骨打同观契丹大内，由西偏门入，乘马过五鸾殿、宣政殿等，并在大内的延和楼饮酒庆贺^[10]。由此推测金兵入城伊始，辽上京皇城内重要建筑损失不大^[11]。天眷元年（1138年），辽上京称谓被取消，改称为北京。天德二年（1150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以大定府（原辽代中京城）为北京，在原辽上京城旧地只被设为北京临潢路提刑司。文献史料表明，到了金代中期，辽代上京城从一个国都已经沦落为一个与蒙古接壤的边陲小城镇了。

金代大安三年（1211年）即成吉思汗称帝的第六年，成吉思汗决定誓师伐金^[12]。次年，蒙古统帅按陈那衍率军东征，收降金朝北边行军谋克契丹人耶律留哥。金贞祐三年（1215年），成吉思汗赐耶律留哥金虎符，为辽王（留哥已于1213年自封为辽王），其中辖有临潢府故地^[13]。次年，耶律留哥追剿叛军，“还度辽河，招抚懿州、广宁，徙居临潢府”。后来又围剿叛将喊舍，“徙其民于西楼”。从文献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辽王耶律留哥这时候似乎有意将原辽上京城恢复旧日的繁荣，原辽上京城（即西楼）不断有人迁入，人气较旺。

金兴定四年（1220年），耶律留哥死，其妻“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耶律留哥长子薛承袭辽王。金正大七年（1230年）即蒙古国太宗窝阔台执政的第二年，命令辽王薛与撒儿台东征，并“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14]，被撤藩为将。此举显然有

明确的政治意图，断绝辽王复国的念头。也许正是有了这种人为的居民迁徙之举，才导致原辽上京城较为彻底的衰落，逐渐变为废墟，成为蒙古族的游牧之地。

二、辽上京城址的再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金代中期，辽上京城已经衰败成金国的地方小镇了。金代晚期，蒙古人已占领临潢府故地。第二任辽王薛阁被撤藩移镇广宁府以后（1230年），辽上京城址便逐渐沦为废墟，成为了蒙古人的牧场^[7]。

从元代以后，辽上京城为世人淡忘了数百年之久。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清代史地学者张穆在踏查巴林旗山水系时，重新发现了辽上京城址。在其《蒙古游牧记》中明确了辽上京城的具体地理位置：“今巴林东北一百四十里，当乌尔图绰农河会和戈图农河之处，有波罗城，趾周二十里，内有三塔，久毁，疑即古之临潢。”^[8]清末学者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中，经过考证，更改旧说，认同了《蒙古游牧记》的观点，即确定巴林波罗城实即辽上京临潢府故址^[9]。李慎儒在《辽代地理志考》中也指出“辽之临潢府，当在内蒙古巴林部”^[10]。至此，被淡忘了数百年的辽上京城，又浮出历史的水面。这确实是中国历史学界一件较为重要的事情。

根据清代学者考证的可靠线索，20世纪初，一些外国考古及相关学者率先对辽上京城址给予了关注。1908年和1930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两次到巴林左旗进行考古勘察，认同了我国学者对辽上京城的判定，还对辽上京城内遗迹及其南塔等进行了勘测，并推定辽上京皇城内的石人为观音菩萨像^[21]。1912年和1920年，法籍天主教神甫闵宣化（或称牟里）实地

考察了赤峰地区的辽代诸城址，结合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他断定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一华里的“波罗城”，就是辽代上京故城。“波罗城即为古之上京。盖一因其地有南北二城；二北城高于南城，北有敌楼，南无敌楼，与史志相符；三在二水汇流之处，又距祖州四十里也。”⁽²²⁾至此，辽代上京故城的地理位置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解决了中国东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辽上京城址的考古勘查、试掘和初步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又多次对辽上京城进行过考古调查，并进行过专题研究。江上波夫、田村实造、黑田源次、三宅俊成和大内健等都先后勘查过辽上京城址⁽²³⁾。

1940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发现了所谓的辽上京皇城内瓷窑址，并于1944年与我国学者李文信先生一起进行了发掘，劫掠了8000多瓷片等遗物⁽²⁵⁾；同时还发现了城外的南山窑和白音高洛窑⁽²⁵⁾。1944年，李文信先生还对上京南塔附近火葬墓群进行了勘察。这是中国学者较早从考古学上对辽上京城址进行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辽上京城又遭到了人为和自然的破坏。1954年，汪宇平先生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调查⁽²⁶⁾并清理了上京附近的白音高洛辽墓⁽²⁷⁾。郑隆先生随后对辽上京城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遭到破坏的情况表示了关注⁽²⁸⁾。鉴于辽上京城址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在文物工作者的关注和国家文化部门的重视下，1961年辽上京城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配合保护管理，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辽上京皇城进行了重点勘探，“而对汉城和郭郭的情况未作更多的了

解。在皇城的勘探调查工作中，特别着重城墙和城门的建造结构和纵横街道等交通规划的钻探，对城中官殿、衙署、寺院和作坊等布局设施情况也作了初步了解。”“并选择重点，开探沟两条。此外，还测绘了皇城遗迹平面图和地形图。”时隔 30 多年，参加勘查的学者于 1994 年发表了正式的考古勘查报告⁽²⁹⁾。这是目前研究辽上京城址最重要的一批考古资料。限于当时的主客观的工作条件，尽管是近年发表的资料，但仍有诸多可商榷之处。

1973 年，辽宁文物普查队对辽上京城址也进行了勘测，资料未见报道。1997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辽上京城进行了航空摄影，利用高科技对辽上京城做一全新的考察⁽³⁰⁾，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1997 年 8 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上京城进行了试掘，共开探方 4 个，发掘面积 80 平方米⁽³¹⁾；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再次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全面地勘测、钻探和试掘，绘制了等高线城址实测地貌图，并在皇城南部的正南街上，试掘了一条长 20 米、宽 3 米的探沟，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³²⁾。2002 年，考古工作者在辽上京皇城和汉城内分别进行了试掘，又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第一手资料⁽³³⁾。

凭借天时地利，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特别是参加辽上京城址考古勘查工作的学者陆续对上京城进行了初步研究。此外，杨宽、徐苹芳等先生在相关论著中也对辽上京城址提出过较为独到的见解。

王晴先生认为上京有二城，“北曰皇城，南曰汉城”。皇城大体分为外城和内城（大内）。作者为了与文献记载上京“幅圆

二十七里”相对照，将皇城和汉城的各自周长和相加，显然是不对的（皇城周长 6344 米，汉城周长 5829 米，总长 12173 米，合计 24.34 里）。但是文中论及城内现存遗物和历年出土文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实物资料，如刻有“上京都”字样的陶砚等⁽³⁴⁾。这是研究辽上京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李逸友先生认为辽上京城是“仿照中原的营建制度，在城中筑起三大殿，并在皇城之南增筑了汉城，于是全城平面形成日字形”。上京城总周长（皇城和汉城）为 8916.9 米，合 17 唐里。认为辽史记载“幅员二十七里”应是“幅员一十七里”之误。并认为城内建筑空间哪处是何官署、府第、寺观、作坊，“在未获得确实证据前，只能是妄加揣测”，如天雄寺的推定等⁽³⁵⁾。

李作智先生则认为上京城分皇城和汉城，更名上京前称为内、外城。“其所谓‘郭郭’，即上京之汉城。”“而当时所谓‘子城’，则是指其大内官城而言。”⁽³⁶⁾

张郁先生认为“《辽史》说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这段话说的是郭郭。”并根据考古资料，指出汉城东西两墙的北端与皇城南墙没有连接关系，间距比皇城宽⁽³⁷⁾。项春松先生也持相同的认识⁽³⁸⁾，但是在书中论述与所用的平面示意图明显有矛盾。

杨宽先生认为“上京大体上采用了唐代长安的体制，同时又保留了契丹旧有的礼俗。”“在皇城之南特设汉城，是辽的都城所特有的体制，汉城具有外郭城的性质。”并指出“汉城是特设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居之处。横街有楼对峙而下设市肆，这种市楼是用以监督管理市上贸易的，也还仿照中原设‘市楼’管理‘市’的制度。”⁽³⁹⁾我们认为，杨宽先生关于辽上京